

明清复仇评议的文化审视

王立

摘要：明清人们对于复仇义举，在新时代背景下有了重新审视和价值发掘。以古证今，借史生论，对复仇主体予以宽纵处理的认同与争议，都体现出重建更为合理的社会秩序的努力。1、对动物复仇的载录和重视；2、对同一复仇事件不约而同的载录或复述，异文众多；3、对前代有定评的复仇事件，进行重新审视评定；4、从社会效果着眼，对弱小伤残者复仇的深切同情；5、对盲目肯定复仇、效法复仇的非议。

关键词：明清时代；复仇评议；价值观念；文化心理

中图分类号：K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017(2010)02-0087-06

复仇不仅是古代中国浓郁普遍的习俗，发生过许多引起争议轰动的事件，也是恒久的文学主题，在传统社会发生一系列转变的明清时期，对于复仇，也产生了种种评议，值得予以关注和思考。

一、对于妇女儿童复仇抗暴的褒举

明清时代，人们对于复仇义举，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有了重新审视和价值发掘。对古来孝子复仇的评定，元明之际，杨维桢《独禄篇并序》大力宣扬之：“古乐府《独禄篇》，为父报仇之作也。太白拟之，转为雪国耻之词。予在吴中，见有父仇不报，而与之共室处者，人理之灭甚矣！为赋此词，以激励孝子之节云。”郭茂倩《乐府诗集》卷54载诗咏“独禄独禄恶水浊，仇家当族，孝子免污辱。孝子躯干小，勇气满九州。拔刀削中睨父仇。父仇未报，何面上父丘。漆仇头，为饮器。脔仇肉，为食噉，头上之天才可戴。”特色是孝子躯体瘦小和复仇的坚决，而此序则赋予复仇主体以民族情感，试图将事件的意义提升放大到“雪国耻”的高度。

以古证今，强调儿童为母雪怨的正义性及其至诚可嘉，也见于载录：“唐严武幼时，以父挺之爱其妾元英，不礼其母，夺槌击碎元英之首，此古今所叹异。而嘉靖中叶，有山西保德人崔鉴，年十四，

以父私邻女魏氏，斥逐其母，鉴不胜愤，乃手刃魏氏。其事上闻，上以幼能激义，特贷其死，发附近徒工三年。孰谓古今人不相及也？武虽婴孺，然世家胄，允熟闻节烈；鉴闾巷无知，发于至诚，较更难矣。”^①求得儿童复仇行为的超越社会阶层性质，从而突出儿童复仇的“天性”本能，也旨在总结复仇亚文化超阶级性的共同价值。

然而，从维护统治秩序尊严的角度，也有人借史生论，认为不能对那些因孝报仇的一概宽纵。以古代一些年轻复仇者复仇方式有僭越不敬之嫌，明代就有人借此予以严厉的非议：

淮南厉王母自杀，常心怨辟阳侯，未敢发。文帝即位，王入朝，自袖铁椎，请见辟阳侯，即椎杀之。驰走阙下，肉袒，曰：“臣谨为天下诛贼臣，报母之仇。”帝伤其志为亲，赦弗治。宋龚颖初仕南唐，后归太祖。先是，叔父慎仪守歙州，为卢绛所杀，颖袖铁简入朝，会绛来殿见，颖遽前击伤之。太祖惊问故，颖以状对，因俯伏待罪，太祖叹曰：“义士！”遂诛绛而释颖。嗟夫！报仇，义举也，然独无其所乎？鞶毂之下，庭殿之前，袖椎挟刃，肆无忌惮，不敬甚矣！释之不问，是长乱之道也。^②

收稿日期：2009-03-10

作者简介：王立（1953-），文学博士，吉林大安市人，大连大学语言文学研究所教授，东北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

①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18《崔鉴孝烈》，中华书局，1959年，第483页。

②方鹏《责备馀谈》卷下《龚颖报仇》，《笔记小说大观》第12册，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4年影印，第71页。

由于商业文化的兴盛带来的价值观的变化,平民伦理较多介入到复仇价值意义的评定之中。对于复仇正义性质的评定,还会改变旧有价值观的总体格局。如“万恶淫为首”就在正义复仇的辉映下,变得需要重新思考了。如京师有某人与私通之妇期约私奔,出于顾虑,竟诱其夫拗其项死,抓出眼睛。不料其夫得神医疗治复活,恢复视力,告妇真相:“妇亦感悟,喊众,以其人闻官抵罪。”载录者从京官处得知这“一时盛传”的新闻,感慨道:“斯人恶,最毒淫,使救之者不异不神,舒项还睛,所以为异;诛暴维世,所以为神。又使无人之庭有床琴之客,私奔之妇成厕剑之忠,何其至妙至妙!谚有之:‘人愿如此如此,天道未然未然。’”^①对于这一触犯淫罪妇女人格的确认,基于明中期对妇女节烈严格要求的观念,充分考量其及时改过、为夫复仇的醒悟和决断。而对于正义复仇、秩序重建的深层价值观,也是维护社会和家庭和谐,反对民事暴力的大众心理的折光。

可见,面对积累深厚的复仇文化史实及观念,不论是以古证今,还是借史生论,都体现出明代之后人们将古代复仇文化作为一个价值参照,来试图重建更为合理的社会秩序的努力。

二、对于复仇主体予以宽纵处理的认同与争议

对于正义复仇、以暴抗暴的肯定,是明清时代普遍的心声。^②但是,在辽远的历史时空拉开距离凝视,有识之士也体察到了褒奖复仇之“礼”的价值观,与法制社会的尖锐矛盾。

首先,是反对宽纵复仇者,强调法制的:“汉有杀人自告而得减免之律,其将导人以无欺也欤?所恶于欺者,终不觉而仇其匿(匿)也。夫既已杀人矣,则所杀者之父兄子弟能讼之,所司能捕获之,其恶必露,势不可得而终匿也,而恶用自告为?小人为恶而掩蔽于君子之前,与昌言(直言无隐讳)于大廷而无忤赧也,孰为犹有耻乎?自度律许减免而覬覦漏网者,从而减之,则明张其杀人胆,而恶乃滔天。匿而不告者,鼠也,告而无讳者,虎也。教鼠为虎,欲使天下无欺,而成其无忌惮之心,将何以惩?故许自告者,所以开过误自新之路,而非

可以待凶人。凶人而自匿,民彝其犹有未斲,不较瘥乎?”^③指出复仇杀人而后自首,就能得宽纵,不合乎情理。因为反正杀了人就必然暴露,实际上是自欺欺人。这实际上是在承认个体生命价值的基点上,对私自仇杀的社会现象的一种深刻反省。

其次,是与上相反的观点,即同情复仇孝子,提醒地方官予以保护的。对清初王恩荣这样一起“儿子长大后为父报仇”事件,官员的宽纵处理就得到查史有据的肯定:“唐以前,复父仇不抵死者多,至唐始有抵死者。宪宗时,梁悦复父仇,职方员外郎韩愈议,复仇之名同而其事各异,有复父仇者事发,具其事下尚书省集议以闻,灼处之。有诏以悦申冤请罪诣公门,流循州。自后多得减死,然犹不免于戍,如明之何竞、张震皆然。至本朝蓬莱王孝子之复父仇,竟得开释,复功名,则以典狱者贤能,能体圣天子孝治天下之意也。其藏词推原律意,尤足以维国宪而厌人心。”为了强化论点,下引述李肇《国史补》对余长安为父叔复仇被判处死罪,引起争议和不满的载录,进而重申:“以王孝子事相较,非今之远胜于古耶?康熙己未,乌程有严孝子廷瓚复父仇,诣县自首,县令欲生之,为请于上司。方俟督抚具题,而孝子已死于狱,盖为仇家贿狱吏杀之也。牧民者鉴此,益当加意致慎矣。”^④此事《清稗类钞》、《清史稿·孝义传》等有载,从维护地方教化的角度,符合清代统治者占领中原后“以孝治天下”的深远策略,应该说,特定时期的确起到了维护秩序、稳定民心的历史功能。

当然,也不能忽视,在清末国势日蹙,时人依旧用复仇的激越音响,激励在外侮面前麻木不仁的愚弱的国民:“复仇一事,韩、柳皆有文,吾谓均不必援以古昔之礼与律,但问人非禽兽,未有不知身所自来者。虽代朋友复仇,吾犹伟之,况吾亲宁朋友之比。人杀吾亲,吾不复仇,即为禽兽。至复仇以后,无论国法如何,律意如何,《经》意如何,法吏之主张、经生之腐谈,一一皆可置不问。但此心已活,外身虽死无恤也。况公道在人,犹有不必死者在耶。然当其复仇时,有几微求生之心,则力且不奋。盖复仇,天理也,公心也,一涉求生,则

①王同轨《耳谈类增》卷49《白髯公》,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419页。

②参见王立、刘畅《中国古代文史中的女性以智抗暴母题》,《大连理工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第77~82页。

③王夫之《读通鉴论》卷2,中华书局,1975年,第45~50页。

④陆以湑《冷庐杂识》卷2,中华书局,1984年,第77~78页。

公心与天理皆蔑（无）。”^①因为，在内外交患的危机面前，维持所谓的秩序已经没有意义了。

三、对于刺客行刺动机效果的求真复议

早在中唐时期，《乐府诗集》卷95天才的诗人李贺《白虎行》一诗，就站在代人行刺的义士角度，为这些蒙受失败之辱，又承领悲剧命运的刺客鸣发不平：“谁最苦兮谁最苦，报人义士深相许。渐离击筑荆卿歌，荆卿把酒燕丹语。剑如霜兮肠如铁，出燕城兮望秦月。天授秦封祚未终，袞龙衣点荆卿血。殊旗卓地白蛇死，汉皇却是真天子。”这些刺客的人格价值何在，是否真的像后世不少人们所尊崇的那样，其忠心可昭日月，无可挑剔？

对此，明代之后，人们进行了较多细致的考索和思考。而在这其中，曾经背离旧主，投靠旧主的对头智伯，后来执着地为智伯吞炭劈面复行行刺赵襄子的豫让，没有从一而终，所受非议最多。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就是如是议论：“豫让漆身吞炭，以愧人臣之怀二心者，让盖以义士自许也。当时凛然义之，后世亦翕然义之，至苏氏、胡氏直以为圣贤大学之道。甚矣！宋人之陋也。余以为，让特刺客之好名者，非惟弗知义，殆近于弗知耻，其所言正以教人臣之怀二心而胡以愧也。……”^②事实上，这是基于“节义”伦理至上的新的时代标准，对于春秋时期古人进行的一种“追认式”的评价，也是与明代复仇文化浸染了新的内蕴之后，所带来的观照眼光的变化^③。实际上，也可以说是对于古代刺客行为动机的一种求真式的复议。

当然，从激励豪情的审美效果看，也不乏继续推重刺客侠义复仇精神的，如金匱徐大令的《易水怀古》诗咏荆轲为燕太子丹报仇“慷慨以身殉”，尽管如同“渐离之筑张良椎”一样未能成功，然而毕竟：“奇气郁勃，读之可下酒一斗。”^④

四、对于提取复仇精神积极意义的重视

在古代中国讲究复仇的文化圈内，对于复仇的标举大有“好人向坏人复仇”的一面倒倾向，因而

向历史与现实生活中寻求正义复仇的材料和话题，是明清时代人们所热衷的。

首先，是对于动物复仇的载录和重视，当然有对于清官断案善于发现蛛丝马迹的揄扬，对于灵兽报答恩主的赞赏，但其中以复仇实现的正义必得伸张的意旨，也是十分鲜明的^⑤。灵兽们未必是有意识的举动和某种物种属性自然生成的特长，都被复仇报恩的伦理话语所充分阐发和定向放大了，于是形成了野史和小说中一系列叙述话语模式，并且广泛渗透到长篇小说，尤其是世情与侠义公案题材的叙述中。

其次，是对于同一复仇事件的不约而同的载录或复述，多种异文的出现，如明代浙江武义县（金华）王世名复仇事件的纷纷谈论^⑥，清代的治河名臣栗毓美微时被陷冤案得到义女解救，以及后来的张汶祥为友复仇行刺高官马新貽（刺马）等，皆是。其共同特点是异文众多，细节微差而大体情节基本接近，总的价值评定趋于一致，说明事件的新闻轰动效应，传播的迅速和普遍。

其三，是对于前代基本上有定评的复仇事件，进行重新的审视、发掘和正面价值评定。在这一价值观的深在支配下，当年刘备为弟复仇，得到了更多的理解和更加合理的解释：“刘先主与云长结为兄弟，义气甚重。方即位，而云长败死。平时共患难死生，不少须臾离，而一旦委之虎口，即忝为兄，又做皇帝，戴平天冠，而弟仇不少泄，当日誓言为何？又何以见天下？故刘先主之行，决不可已；既不行，亦须枉受张翼德一番臭气，驻手不得。惟一败，气结而死，故可以下见云长，而先主之心，亦可以无愧无憾。此正英雄本色，天下为轻、义为重者。况乘此机会，及其锐而用之，直下吞吴，亦未可知。当时孔明知先主之心，亦不强谏，既败，泣下曰：‘法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东行；纵行，必不倾危。’亦是感慨无聊之言；非孝直真能制之，而保其不败也。”^⑦

即使是宋元之后因强调南方正统而在民间广受贬抑的曹操，其雪报父仇的屠杀，也得到了较为客

①林纾《畏庐漫录·韩孝子》。

②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15《史书佔毕三》，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2001年，第155页。

③参见王立、潘林《豫让复仇故事在后代的接受及其争议》，《甘肃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第139~142，第99页。

④梁绍壬《两般秋雨盒随笔》卷3《荆轲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65~166页。

⑤王立《动物为主雪怨母题的文化阐释》，《荆州师院学报》2001年第3期，第41~45页。

⑥王立、曲艺《王世名复仇叙事的渊源及其与清官文化之关系》，《学术交流》2008年第5期，第151~155页。

⑦朱国祯《涌幢小品》卷14《先主伐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9年，第279~280页。

观、全面和多元评价的分析：

曹操父见杀而兴兵报之，是也；阬（坑）杀男女数十万人于泗水，遍屠城邑，则惨毒不仁，恶滔天矣。虽然，陶谦实有以致之也。谦别将掩袭曹嵩而杀之，谦可谢过曰不知，然使执杀嵩者归之于操，使裔割而甘心焉，则操亦无名以逞。乃视嵩之死，若猎人之射麋鹿，分食其肉而不问所从来，亦何以已暴人之怒哉？且操之击谦也，以报私仇，而未尝无可托之公义也。李傕、郭汜称兵向阙，杀大臣，胁天子，人得而诛者也。谦首唱诛逆之谋，奉朱儁以伐逆而戴主，傕、汜以太仆饬儁，以牧饬谦，其力弱而畏我也可见矣。知其弱，惧其饬，儁虽志义不终，而谦自可奋兴以致讨，乃听王朗之谋，邀宠于贼臣，而受州牧之命，则欲辞党逆之诛而无所适；操执此告天下，而天下孰为谦援者乎？盖谦之为谦也，贪利赖宠，规眉睫而迷祸福者也。然则曹嵩之辎重，谦固垂涎而假手于别将耳。吮锋端之蜜，祸及生灵者数十万人，贪人之毒，可畏也夫！^①

即使先前获得肯定评价的，若非毫无保留的褒许，人们也犹感不足。对张良的评价就有借题发挥的：“凡事可忍，而家国之仇不可忍。留侯之最可敬者，在为韩报仇。博浪沙一击，事虽未成，而六国后之起兵亡秦，肇端于此。苏子谓其不忍忿忿之心，逞于一击，为圯上老人所深惜，未是的论。”^②

其四，对于弱小伤残者行使复仇的深切同情，也往往从社会效果方面着眼。如乾嘉之际著名学者叙述一瞽者持续十馀年寻仇，终于与仇人同归于尽，后评议：“夫以无目之人，倘有目之人，其不得决也；以孱弱之人，搏强横之人，其不敌亦决也。此较伍胥之仇楚，其报更难矣。乃十馀年坚意不回，竟卒得而食其肉，岂非精诚之至，天地亦不能违乎！宋高宗之歌舞湖山，究未可以势弱解也。”^③

而跛者为父报仇，数年如一日学艺，终于艺成觅仇以报，也有青城子《志异续编》卷3慨而系之：

“以不能行立之废人，欲向强勇之拳师报仇，斯已难矣。乃百折不回，竟能自我而毙。其志专，其心苦也。古之报父仇者，类皆伟男子大丈夫，犹或假他人之力，以成己之志，甚或不能及身而报，即能报，又或不克手刃。虽势之大小不同，其难易则一也。如跛者，真可以无恨矣。”^④

至于孝子黄洪元兄弟，持斧斫仇之后，得到地方官免罪。也有同县人们纷纷作传为文，传播者意犹未尽，引古证今，标举其合理合情：“昔汉董黯以母仇杀王寄，虞仲翔谓白日报仇，海内闻名，而句章遂以慈溪名县。洪元乃兄弟同志，且出自少年，孰谓古今人不相及耶？当日手治斯狱，亦必有道君子，能为国家扶翼风纪者。（按，董孝子事，范、袁二史不为立传。唐碑称“微拜郎中”，未尽可信。独《晋书·孝友传序》及《许孜传》推崇备至，此确证也。）”^⑤论者评议的逻辑基础或曰大前提，是以古为准绳的，然而却能得出今人不逊于古的结论，根据虽然只是一个孝子复仇的事例，却比起唐代之后屡屡判处孝子杀仇者死刑，要更加“复古”，直逼汉魏六朝的宽纵复仇孝子的价值标准。在对于复仇主体为“少年”的特殊性之中，令人感受到“为国家扶翼风纪”的积极意义、社会效果，得到了更为充分的重视。

反思对复仇者处理不当的历史教训，自然也是倡扬正义复仇积极效应的题中自有之义：“子玉杀而晋文喜，孟明用而晋师不敢出。凡人怨积于仇仇者必深，勇激于愤耻者倍奋，感生于恩宥者忘死。一夫拚命，万夫莫当。两霸主所见同，而楚成失之矣。”^⑥对具有偏激执着性情的复仇个体，不能求全责备，而更要看到其难得的主体内驱力带来的巨大推动功能，这也是从复仇正面价值角度考虑问题。

五、对于盲目肯定复仇、效法复仇的非议

“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汉代飞将军李广，是唐宋人们心目中御边英雄的代表，然而，在明代却有了这样的非议，说他曾为了报复霸陵亭吏

①王夫之《读通鉴论》卷9，中华书局，1975年，第277～278页。

②龚炜《巢林笔谈》续编卷上，《博浪一击》，中华书局，1981年，第180页。

③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卷18，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454页。

④《笔记小说大观》27册，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4年影印，第373页。

⑤陈康祺《郎潜纪闻四笔》卷9《孝子黄洪元为父报仇》，中华书局，1990年，第149页。

⑥龚炜《巢林笔谈》续编卷上，中华书局，1981年，第198页。

的侮辱，重被启用时便立即设法将其杀掉：“殊无长者之风，此后之所以多不振也。”一代名将的悲剧命运，竟然被解释成这一事件导致的，并非公允，因此也有不同意见：“夏君宪曰：‘快仇报怨，武弁常态也。且霸亭吏亦自可杀，炎凉小人，何足以累长者！’”^①认为要从武将性情上予以更多的理解和宽容。这颇有角色身份分析的眼光。

复仇效果究属如何？其实，对于最初肇事者的惩罚，泄愤伸冤，也未必全然值得肯定，可能带来的副作用也在所难免，于是有这样的反思。说是明末有官在雷州上任途中被盗贼杀害，妻女留下，盗中黠冒充上任：“抵郡逾月，甚廉干，有治状，雷人相庆得贤太守。其寮属暨监司使，咸诵重之。未见，太守出示禁游客，所隶毋得纳金陵人只履，否者虽至戚必坐。于是雷人益信服新太守乃能严介若此也。”但真太守的儿子前来寻父，冒充者败露受惩。雷州人这才知道廉洁能干的太守原来是盗。如何评价真官与假官，载录者引东陵生的态度：

闻而叹曰：“异哉！盗乃能守若此乎？今之守非盗也，而其行鲜不盗也，则无宁以盗守矣！其贼守，盗也；其守而贤，即犹愈他守也。”或曰：“彼非贤也，将间而括其藏与其郡人之资以逸。”曰：“有之，今之守，亦孰有不括其郡之藏若贄而逸者哉？”愚山子曰：“甚哉东陵生言也！推其意，足以砥守。”^②

真官如盗，而假官（盗贼）却如此廉干，耐人寻味，得出了以实际行为判定——而非只看名目的结论。

小说评点，往往带有鲜明的美学价值观和时人的习俗心理，所以也不应忽视。这里姑举一例，即对于小说人物武松和石秀的复仇，也不是没有非议的。金圣叹《水浒传》第四十五回回前总评称：

前有武松杀奸夫淫妇一篇，此又有石秀杀奸夫淫妇一篇，若是者班乎？曰：不同也。夫金莲之淫，乃敢至于杀武大，此其恶贯盈矣，不破胸取心，实不足以蔽厥辜也。若巧云，淫诚有之，未必至于杀杨雄也，坐巧云以他日必杀杨雄之罪，此自石秀之言，而未必遂服巧云

之心也。且武松之于金莲也，武大已死，则武松不得不问，此实武松万不得已而出于此，若武大固在，武松不得而杀金莲者，法也。今石秀之于巧云，既去则亦已矣，以姓石之人，而杀姓杨之人之妻，此何法也？总之，武松之杀二人，全是为兄报仇，而已曾不与焉；若石秀之杀四人，不过为己明冤而已，并与杨雄无与也。观巧云所以诬石秀者，亦即前日金莲所以诬武松者，乃武松以亲嫂之嫌疑而落落然受之，曾不置辩，而天下后世亦无不共明其如冰如玉也者。若石秀则务必辩之，背后辩之，又必当面辩之，迎儿辩之，又必巧云辩之，务令杨雄深有以信其如冰如玉而后已。呜呼！岂真天下之大，另又有此一种巉刻之毒物欤！吾独怪耐庵以一手搦一笔，而既写一武松，又写一石秀。呜呼！又何奇也！

虽从写法说，实际上对石秀复仇动机的是否正义性，提出了疑问。这是在同武松为兄复仇——因武大已死需要亲兄弟为之伸冤的比照中，得出的令人信服的结论。其实，即使对武松，其复仇扩大化和残忍化，金圣叹也并非没有感觉，艾梅兰指出，金圣叹等评点者试图分散读者在阅读复仇血腥场面时的注意力：“他在字里行间所作的某些点评使读者能与一些道德上有问题的段落拉开距离。比如，金圣叹对武松弑杀嫂嫂潘金莲一段几乎是一句一评，这就打断了句子的连贯性，把读者的注意力拉向了文法而不是内容问题。虽然很多读者都觉得武松用潘金莲血祭的行为可因其替兄复仇而被宽恕，但是金圣叹还是用了许多相同的技法把读者从武松在鸳鸯楼血腥地滥杀无辜的场境中——他在那里屠杀了一家人，包括仆人和孩子——拉开。金圣叹持续不断地分别点评每次出现的‘腰刀’、‘灯’和‘月’，以此把读者的视线从大屠杀中引开。在乱纷纷的有关武松需要换刀——因为第一把刀已经太钝，没法干净利落地‘割头’了——的描写之后，金圣叹评道：‘十九写腰刀。半日可谓忙杀腰刀，闲杀朴刀矣。得此一变，令人叫绝。真正才子。’……”^③的确，如此转移视线，顾左右而言他，确暗含有对复仇主体如此滥伤无辜的不满，而对于笔下深爱的

①张燧《千百年眼》卷5，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74页。

②徐芳《雷州盗记》，张潮《虞初新志》卷5，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95～96页。

③（美）艾梅兰《竞争的话语——明清小说中的正统性、本真性及所生成之意义》，罗琳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1页。

人物和作品，又不得不作此掩耳盗铃式的阅读导引。

无疑，打着团伙利益之名，行一己之私、泄一己之愤行使复仇的，《水浒传》比皆是。而至清代，人们对水浒英雄滥杀无辜倾向的不满，又往往体现在对《水浒传》续书的肯定褒扬中，如蔡昇《〈水浒后传〉读法》评陈忱续书的矫正之功：

本传虽是承前传而作，然煞有胜似前传处。如前传所写杀人之事，固有死当其罪者，却亦有无辜枉死，令人可怜者。如秦明之家眷，瓦官寺之老僧，虽非手刃，然正如王导所云：“我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用事者不得辞其过也。”又如扈家庄已是通和，扈成又将祝彪解来，却将他全家杀死。……本传写所杀之人，或是害民，或是误国，为公议所不容；其小者，亦是与山泊诸人，不是旧仇，即是新恨，素怀怨隙，明作对头，且俱各有应死之处，揆（揣度）之天理人情，必须杀之而后快者。这方杀得并无遗憾，方是真豪杰举动，不是残毒，不是孟浪，比前传为更强也。

可以认为，这一评价是公允的，也是对复仇是否合理，效果如何予以深刻反思的结果。另外据说杭州马观澜的家奴陈某，一晚醉归遇二鬼，女鬼向其索命，大骂其作为小叔，不应助兄杀嫂（女鬼）：“其男鬼掷头撞奴，奴倒地。闻人声，二鬼才散。马氏众家人扶至床，自言少年曾有此事，当时看小说，慕武松之为人，不意遭此冤孽。”载录者称有人告之曰：“小说都无实事，何得妄学？且武松杀嫂，为嫂杀兄故也；若寻常犯奸，王法只杖决耳。汝何得代兄杀嫂？”言未终，奴张目作女声曰：“公道自在人心，何如！何如！”向言者三叩头而死^①。故事表明，接受者已不再是不加分析地敬慕复仇豪侠，而注意到如武松杀嫂报兄仇之类事所可能带来的负面社会效应，其给予涉世未深的少年一种“误导”，带来的巨大代价是难于挽回的。

复仇过当，究竟是否应当，至清代有识之士这里，就更不赞成那种非理性的、不计后果的冲动了。

①袁枚《子不语》卷7《误学武松》，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44页。

纪晓岚就引用“仲尼不为已甚”遗训，强调复仇过当引起的副作用，竟然始料未及。说某大姓遭盗劫，悬赏捕获后就贿赂狱卒，百计折磨之。导致其庭审时自供遍污妇女，众耳共闻，遂“门户玷辱，悔已无及”。复仇造成的“掷石击石，力过猛必激而反”后果，使最初的受害者损失更大，载录者理性地认识到：“取一时之快，受百世之污，岂非已甚之故乎？然则圣人之所虑远矣。”^②这一从复仇效果、副作用角度考虑问题的视角，也是前人较少关注的。

明清人对复仇文献的真伪及保存价值也有思考。如李介《天香阁随笔》卷2就怀疑《史记》赵孤报仇事：“考屠氏在晋国，止有膳夫、公行二官，并无六卿执兵政者。屠岸贾何人？敢于称兵僇事卿之族？晋君不敢问，六卿不敢违，举国不敢议若是，邱明翼经作传，考核必真，马迁去周已遥，传闻未确。故当以邱明为是。”俞樾《茶香室丛钞》四钞卷5认同《柳亭诗话》说，即苏来卿复仇事，非入陈思王文集，无由识其姓氏：“乃知庞娥亲、谢小娥辈，流传万古，正不易易。”

总之，明清对复仇的思考和价值判定变得复杂而多元了。明代文化，史家有这样的伦理归因：“明史里有两点地方，极易引人注意。在政治史上称中央集权，非常显著，全国一千一百多个县，每个县令的任免，全由朝廷号令行之。……在社会史上讲，则以伦理观念代替法律，其程度之深，超过其他任何朝代。”^③清兵入关后出于统治的需要，也持续褒奖汉族民间的忠孝伦理习俗，由元到清，异质文化的注入和社会生活的多元化等，都对于复仇风习的沿袭和人们的思考有所助益。而因为复仇文化的积累也为之进一步丰厚，社会现象的复杂化和民族意识与现存矛盾的增加，对于复仇，人们产生了更加深入的触动和反思，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思路，值得予以继续探讨。

（责任编辑：闫丽）

②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卷15，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378页。

③[美]黄仁宇《明代史和其他因素给我们的新认识》，《放宽历史的视界》，三联书店，2001年，第60页。